

【专题: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 劳动解放的三重悖论

宋建丽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今时代正经历着直接物质生产向智识生产的转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广泛地介入人类生产生活,并对人类生产生活进行全方位塑造,人工智能之于劳动解放的意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话题。一方面,人工智能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光明前景为未来的人类生活带来无穷想象;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广泛存在的劳动的自主性悖论、时间性悖论、意义悖论等同样表明:人工智能之于“劳动解放”,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在人工智能的解放前景与不确定未来之间存在日渐增长的鸿沟。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为西方左翼学者反思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新形态提供了可分析的概念工具。同样,回答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会带来劳动解放,或者说带来何种意义上的劳动解放,需要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对人工智能之于劳动解放的意义予以多重维度的思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马克思;一般智力;劳动解放

【作者简介】宋建丽,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理论探讨》(哈尔滨),2024.2.126~1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帝国主义批判与国际数字治理中的中国话语权研究”(23&ZD014)。

“劳动”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范畴,无论是早期的异化理论,还是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判断,都建立在把握以“劳动”为核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传统的劳动方式、资本增殖方式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决定了现代劳动资料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无人化”“自动化”的智能化生产趋向日益明显,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和最大限度依赖固定资本的“无人化”生产变革正在引发人们的广泛思考。在此背景下,剖析人工智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解放的三重悖论,回到马克思的“一般智力”(the general intel-

lect)范畴,重新思考技术的“制度性运用”之于劳动解放的根本性意义,有助于回答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解放”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一、劳动的“吸纳”与“排斥”

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从功能上讲,其在本质上仍属于“自动机器体系”的智能化。科技发展推动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人工智能以“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从逻辑上根本替代作为动力的工人,也成为一种可能。在“自动机器体系”及其智能化的背后,蕴藏着机器的“自主”与劳动的“强制”同步发生的自主性悖论:与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会带来更加“自主”的劳动从而带来劳动解放的光明前景和期许同步发生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劳动

体系中到处可见的劳动“吸纳”与劳动“排斥”。《赛博无产阶级》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在机器体系从形式到实质的强大吸纳下，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投入高速旋转的机器体系中，无论是如开采稀土、铺设光缆、建造基站等物质性劳动，还是以技术专家身份所从事的非物质劳动，都在构建一个由自动化半导体工厂、机器人装配线、云计算数据中心等组成的世界^{[1]172}。马克思指出，机械发明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结底引起工人生活方式上的改变^{[2]343}。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时代”，制造业曾经是发达经济体中技术最成熟、最能推动经济增长的部门，那么现在的制造业已经成为一个通过无处不在的自动化、准时制流程的供应链而广泛连接的全球化的部门。经由“效率至上”的意识形态，劳动力的灵活性和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绩效至上”的合理性不断得到强化。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和网络，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所说的“平台资本主义”]正在以其快速发展和自动化的应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具剥削性和异化性的积累模式。与传统积累模式相比，平台资本主义自动化程度更高，更具灵活性：一方面，它能够将广泛的社会阶层纳入其积累逻辑，包括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使其变成依赖应用程序和合同的不稳定性无产者；另一方面，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正在普遍遭受“去工业化”的历程，成为被排斥的人、多余的人^{[3]107-117}。这种吸纳和排斥的同步发生，不但发生在制造业，而且发生在所有经济领域；不仅低工资、低技能的人笼罩在机器人的阴影之下，高工资、高技能的人同样如此。也就是说，与全球化、网络化和劳动力吸纳相伴而来的，是劳动场所的日益分散和劳动力的日益碎片化，是驱逐的加速。在生产和流通中，新的自动化水平，加上冷冰冰的算法逻辑，使越来越多的资本与工人相分离。伴随自动化对生产中“人类”成分的消除，当代资本正逐渐把可变资本(人)的再生产置于固定资本(机器)的再生产之下。这是一种加速运动，在向

更高水平的自动化、智能化迈进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不稳定、非正式工作、失业、贫困、在全球不同区域中出现的过剩人口等等，成为排斥劳动的伴生后果。自主运转的机器体系及其背后的算法逻辑，正在日益创制一种新型霸权和控制体系，一个无法讨价还价、无法推理、无法表达情感、也绝对不会停止的系统化的人工机械过程，正在对人类生活造成全方位入侵^{[1]174}。其结果就是：就劳动而言，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在创造表面上自主劳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自动化的“强制”；在广泛吸纳劳动力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大范围的排斥。一方面，劳动者被视为“自主”的劳动力和有“选择”能力的、单个的行为者；另一方面，表面上的劳动“自主”背后是更加隐蔽的平台模式对劳动的控制，以及借助智能算法而实现的对高度灵活的劳动力的“自动化剥削”，是工人贬值、被驱逐直至失业，成为在社会中“不存在”的绝对真空，沦为智能时代的“无用阶级”，失去任何“剥削的价值”。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对工人的这种吸收和排斥，因而，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是特有的现象”^{[2]353}。智能时代的无产阶级，不仅包括为资本旋涡所吸纳并在其核心中工作的人，也包括那些被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排挤出生产岗位，被迫寻找各种形式的能够依赖肉体劳动而生活的人^{[1]114}。在此过程中，智能贫困成为新的贫困形式，不断扩大已有的社会鸿沟。同部分富人和精英享受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增益相比，穷人只能在汹涌的智能化、数字化浪潮中苦苦挣扎，在不断地被排挤和被抛弃中沦为数字时代的“弱智弱能”者，甚至沦为微不足道的“智能机器的奴隶”。他们没有“剥削的价值”，被排斥在全球化经济或社会体系之外，被视为“多余的人”，被社会无情地抛弃。在人工智能的解放前景与不确定未来之间存在日渐增长的鸿沟，一边是被建构为资本的社会一般生产能力，另一边是劳动者日益空洞、脆弱和微不足道的劳动价值，客观化的整体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对

立不断深化:社会一般生产能力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而个体劳动和行动则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无力。

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4]487}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解放性的社会劳动结构的可能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无法普遍实现。虽然社会的生产能力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迅速提高,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能力在历史上建构的形式,并未将工人从局部的、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它将他们纳入生产之中,并将他们转化为生产机器的零件、专门化机器的局部。这种资本建构方式意味着抽象统治被资本建构,在这种社会劳动结构中,存在种种冲突和对立。

因此,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劳动解放。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作为资本而存在的生产力的增长,人们不是为它所解放,而是为它所掳获。同样的发展也标志着物质财富的生产条件和“社会个人”的生产条件之间的日益分离,作为物质财富源泉的无产阶级劳动变得越来越多余。乃至从物质财富生产的立场上看来,无产阶级劳动甚至开始脱离时代的要求,从而“社会个人”的生产也开始脱离时代的要求^{[5]415-416}。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不仅不会必然带来劳动解放,也不会必然导向“社会个人”的生成,因为资本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历史中展开:生产力水平越来越不取决于工人的直接劳动。这一过程导致社会普遍的知识和经验形式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发展,它们不取决于也不能被缩减为直接生产者的技能和知识^{[5]344}。换言之,人工智能只是为劳动解放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可能性,并不能直接实现劳动解放。

二、自由时间的享有与抽象时间的统治

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的广泛使用、智能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使得“节省时间”成为可能。伴随智能劳动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游离出来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赢得对时间的主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乐观的雄心和期许。“变得更快”“更加高效”的逻辑是自动化的基础,并引发了计算机领域的革命。如果说工业机器时代的工人感受到的是“没有特性的”永恒的同步时间,那么,今天的工人正在进一步失去对时间的控制,陷入抽象时间的统治。而且,只要劳动仍然受到自由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的剩余价值规律制约,人们就仍然处于抽象时间的统治中。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拥有的机器,作为系统使用的客观手段,在特定时间内排挤出更多的劳动力^{[4]497-498}。这意味着工人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对生产效率和资本利润的追求使得工具理性成为生产的驱动力,劳动建立在人类时间的异化之上,“无特性”的时间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事实。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时间以同样的节奏前进。能够在一天24小时都工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追求。如果说工业化进程发展出了精确严格的工作与休闲在时空上的分离,那么在智能化时代,这个进程的继续不仅表现为取消自然节奏,而且表现为不断取消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运转节奏,取消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可支配的时间和不可支配的时间之间的任何差别,以赢得对时间的主权^{[6]196}。基于算法的精准度量以及自动化程序的可操控性,劳动时间越来越为抽象的标准时间所固定,传统的“事件时间”为抽象的、线性的时间所代替,任务导向或事件导向变成抽象的时间导向^{[6]196-198}。时间脱离存在成为自在之物,主体越是没有个性,越能适应加速要求和弹性化要求,由此带来的是自我的萎缩,丧失对生活的自治感,生活不再被理解为有方向感的运动,而仅仅只是加速。这种失去方向感和发展愿景的状态成为晚期资本主义

的一种典型病态。一句话,人们将主宰时间的秩序交给钟表,却成为时间的奴隶。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在使标准时间的生产成为可能的同时,也使得弹性生产成为可能。与事件时间被抽象时间取代同步发生的,是任务导向和事件导向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却并非对前现代那种与自然节律相和谐一致的事件时间和任务时间的回归,而是一种资本主义时间的逆转,是一场不可思议的革命,是朝向前现代时间的“虚假回归”。日常生活的弹性化、生命历程在时间上的去结构化,都意味着一种时间对生活世界的“反向殖民”,从工厂夜班对人们生理节律的改造,再到资本主义的“消灭睡眠”,人的生命本身也被置于抽象时间的统治之下。“尽可能有效地利用时间”的新教伦理及其理性化逻辑在生活世界和休闲文化中扎根,仍然存在的生活世界的减速潜力已经朝着有利于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加速的方向发展,并且因此带来资本变现的加速^{[6]199-204}。在现代社会中,时间规范越来越具有一种极权主义性质,成为一种压迫性、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时间,哪怕我们赢得了时间的富足”^{[6]序言7}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悖谬。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使用,在为人人类赢得更多时间的同时,却也可能使现代人面临“时间贫困”的危机,陷入“抽象时间统治”。换言之,时间已经从工人的时间经验中抽象出来。时间通过机器与人疏远,为机器的速度所抽象,为时钟所计算,时间已经变成了金钱,成为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媒介,伴随效率、标准化的加速,成为一种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言的“加速的力量”。此外,抽象时间还以标准化风格的塑造对文化的丰富性、个性进行消除。人工智能在多领域的应用,正在造成时间的大幅节省,然而,正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宣称的那样,福特主义资本主义中的商品文化开始越来越面向标准化,这种标准化无疑就是一种抽象时间对文化的统治。人们通过创新或多样性自然地培养美感并进

行表达的时间越来越少。文化产业的竞争压力总是促使人们不断产生“新”东西或看起来新的东西。过够了数字化智力生活的人,终于知道互联网无异于一个时间陷阱,迫使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当下,人们的感受完全被技术殖民。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被监禁在数字时间和空间的无关系中,与技术和我们周围的人疏远^{[3]182}。

自由时间的享有与抽象时间的统治之间的悖论,揭示出人工智能与资本创造自由时间的矛盾性。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提供了可能,从而也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了广阔余地,但从资本的立场来看,通过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而创造的非劳动时间,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即自由时间。因此,一方面,资本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另一方面,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边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边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2]199}。由此,即便劳动者获得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不一定必然带来其自由全面发展。只要“人的劳动的减少只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2]348},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就会在客观地促进消费全面扩张的同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人们“新”的但可能是“虚假”的需要。人们在自由时间里消费空余时间的同时,也消费着由资本全面扩张带来的全面生产。人们虽然从生产环节中被解放出来并获得了自由时间,但是在消费环节,自由时间又以消费的形式被资本占有,无意识完成资本自我增殖的闭环。

三、感性体验的丰富与自我经验的萎缩

对于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而言,大数据和算法缺一不可。数据的意义毋庸置疑,因为没有数据就不可能进行数据处理,自然不可能发展出人工智能,

但是数据再多,如果没有能力挖掘出数据的意义,就难以发挥价值。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土壤,而算法是产生人工智能的直接工具。人工智能仍然是人的人工智能,但与此同时,由大数据和算法所支撑的人工智能的自动化逻辑,可能会越来越消除人类参与的内在需求,从而造成时空的异化、关系的缺失,进而造成自我经验的萎缩。数字化的时空越来越多地受到机器逻辑的掌控,其意义被预先编码为工具。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性”成为一个虽然由我们创造但越来越脱离我们具体经验的异己性存在,即一个“陌生的、我们自己的”的数字性。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生产和消费过程进入巨大的数字连接、算法收集和工具指导的信息领域^{[31]63}。通过网络以及各种智能服务,如自动化装卸设备、无人驾驶清洁车、无人银行里为顾客提供交互式服务的机器人等等,人们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劳动和消费体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理论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时空脱嵌”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时空客观性的改变。世界作为一个生产、交往和运输的空间已经急剧变小,“本地事件”与“发生在遥远距离之外的事件”彼此相连,人们感性体验的丰富性在时空维度得到最大限度的延展,然而,与这种感性体验丰富性的延展相伴的,却是自我经验不可避免地萎缩。在全球资本主义数字化的过程中,现代人空间感逐渐模糊,越来越无法对一个地理空间产生亲密感,这些空间就是罗萨所谓的缺乏“共鸣”的空间,没有故事,没有回忆,没有交织自己的经验和认同感的异化的空间。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诊断出西方现代社会持续出现的经验丧失“症候”,这是由于主体没有能力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体验转化为真正的经验而产生的。因为体验只有当他能够与那些个体的和集体的过去和未来之间产生意义重大的联系时,才能变成经验。对本雅明而言,以短暂模式为标准的社会是一个虽然体验丰富但经验丧失的社会,

它似乎使时间在体验当中和在记忆当中同时化为乌有^{[6]172-173}。本雅明所说的这种以短暂模式为标准的西方现代社会,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下进一步得到强化,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网络时间表现为一种“时间逃逸”,其方向总是朝着更快、更多内容的连接加速。在网络中,没有有意义的过去或未来,只有“数字的现在”。网络空间使“工作场所”的概念变得过时,人们几乎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回复电子邮件,工作不用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空间或时间,感性体验的丰富性极大增加,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却或者为太多的信息选择所束缚,或者为某种“既陌生又属于我们自己”的冷冰冰的数据所压迫。

时间可以用钟表客观地测量,但主观时间体验却难以捉摸,因为对时间长短的主观感受,往往由我们所身处的情况和参与的活动而定,但人工智能和数字媒介时代,基于屏幕的去感官化、去背景化体验,与我们是誰、感觉如何都无关。屏幕前的体验是没有意义的“共鸣”,只在脑中留下浅浅的“记忆痕迹”,甚至更倾向于快速遗忘。深层记忆痕迹的缺席,决定了记忆时间极为短暂,时空只是停留在恒定的当下,自我经验日益萎缩,屏幕前的“主体”极易成为一个被信息包裹、蚕食、不能行动、不能自主思考的惰性存在。除了自我经验的萎缩,时空异化还带来更具深度的“无关系的关系”的异化后果。在当代批判理论代表人物拉埃尔·耶给(Rahel Jaeggi)看来,异化指的是“一种异化的行动”^{[7]157},即有缺陷的行动。相悖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自由行动,异化行动或有缺陷的行动意味着主体自我决定的不可能,即我们的行动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没有真正参与到自己的生活中,表现为在生活中被推着前进,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在耶给看来,一种成功的非异化关系意味着:应该属于一体的事物实际上也相互所属,应该相互联系的事物实际上也相互联系。而异化的有缺陷的关系则表现为“与实际上应该属于一体的事物的分开或分离,仍然相互联系的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结的丧失”^{[7]25},即有关系的事物在现实中

呈现出无关系的表象。

总而言之,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连接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时空压缩,通过数字网络把人从与技术和自然的原始关系中排除出去,人被孤立地放逐到“无关系”的后现代条件下,不仅与本该属于一体的技术和自然分离,而且与本该构成并支撑自身生命经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遗产失去联结。由于资本创造的数字时空逻辑只是根据其自身的编码和自动化要求塑造经济和社会,这使得人类影响事物发展轨迹的能力大大减弱。此外,在全球规模和复杂性层面运行的算法逻辑,极易从本质上脱离物质的、物理的现实,并形成适合其自身的存在方式。我们不仅缺乏对算法逻辑如何运作的充分理解,也未能充分认识到它是一种异化的逻辑、一种“算法本体论”,其运转过程体现为复杂的“代码堆积”,当程序转化为代码,代码转化为算法,然后算法开始创造新的算法,它离人类的主体性也就越来越远,异化为一个没有人能完全理解的代码世界^{[3]103-104}。作为一种日益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力量来源,它与人类尺度的世界以及人们在此世界中建构的现实相去甚远。

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除了通过劳动和收割用户数据完成积累,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告。众所周知,谷歌、Facebook、优步、亚马逊等公司的算法跟踪是科技公司与消费者之间保持“交互性”的重要手段,Web2.0驱动的数字化貌似在广告和消费者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人们在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中工作、娱乐、生产、消费、交往,然而,正是在这种表面上自由的“交互性”背后,人们却不知不觉被卷入由商业符号所建构的普遍市场化的网络之中,例如算法被用来精准定位并选择性地投放广告。弗朗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将这种发展视为“符号资本主义”的到来,一种建立在非物质劳动和信息领域爆炸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在其中,时间和空间经由促销的商品符号而被数字化穿透,成为人类异化的一个方面,建构起我们通过数字化

而与符号和文字之间的“无关系的关系”^{[3]110}。

四、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之于劳动解放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曾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一范畴来描述一个可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2]200}马克思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定义为:“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2]199}这里,马克思给出了“社会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概念,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理解,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劳动解放至少与社会个人的生成、自由支配时间的增长密切相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牢笼中,主体越劳动,越自我奴役,越劳动,越自我剥削。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导向“社会个人”的生成和劳动解放?这就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来重新理解。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任何机器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也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198}。显然,这里的“一般智力”并非个人智力,就马克思这里的“一般社会知识”而言,显然指的是一种社会总体智力,它经由一个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而形成。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一般智力主要对象化为固定资本,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生产的发展历程,就是资本不断吸纳一般智力并使后者实现与劳动彻底分离的过程^[8]。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相伴生的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等新的劳动形态的出现,表明“一般智力”在继续对象化为固定资本的同时,也正在逐渐与劳动融合,并通过劳动过程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时至今日,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分析仍然相关于现时代。“一般智力”的概念表明:普遍化的劳动产生出普遍化的智力,普遍化的劳动是全部科学的劳动,全部的发现和发明,知识、交往和技术因而成为公共受益品。马克思预料到信息经济的出现,因为资本家的利润不可避免地催生出提高生产率的需要^[9]。技术进步极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在生产中的相关性,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使用,无疑为扬弃异化劳动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可能的技术准备。尽管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提供了广阔前景,但并不能自动带来解放。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虽然机器生产本身有利于人的解放,但其资本主义应用却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引导了巨大的、社会一般的生产力,然而,这一历史建构过程,却成为一个异化的过程。这些力量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中,成为资本的力量、“主人”的力量^{[5]397}。换言之,“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2]187}。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异化劳动的克服以及劳动解放,人工智能只是为劳动解放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准备。我们仍有必要再次审视人工智能的“制度性”运用,在社会制度的运用背景中,重新衡量人工智能如何促进有限的劳动解放。

首先,人工智能的“制度性”运用至关重要,“一般智力”及其作用方式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话题,不能脱离制度背景抽象地加以谈论。马克思曾批判“经济学辩护士”的无历史性和抽象性,认为他们之所以无法区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和“机器本身”,无法想象对机器的资本主义之外的使用可能,原因在于他们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来理解工业生产,并由此将所有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批判者都斥为

“技术进步的敌人”。实际上,人工智能的应用显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全社会领域变革的系统性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解放的可能性和程度,受资本增殖规律的限制。只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仍然服务于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的目的,那么,即便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会带来大量时间的节省,节省下来的时间也是被转化为剩余劳动,人工智能技术充其量只是有助于实现有限度的劳动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只要资本关系没有被彻底推翻,“一般智力”就只可能屈从于资本的宰制,“一般智力”能否成为所有主体的共有财富,依赖于“一般智力”是否能够从资本关系中解放。

其次,需要重新思考劳动内容之于劳动解放的意义。强调劳动解放的“制度性”背景和前提,就是强调劳动内容之于劳动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在异化的生产力和活劳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冲突,随着前者的发展,后者变得日渐空洞与碎片化:“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4]487}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工业劳动过程的对抗性和矛盾性质,来自提高生产力的持续动力和消耗直接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这一张力导致生产体系在工人面前发展为一个客观的体系,它将工人纳入其中,作为其组成部分。“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4]548}。由此,巨大的生产力和碎片化的、空洞的直接人类劳动成为工业体系的两个典型特征,其特点在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物质对立,在于人类劳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碎片化与空洞化,以及工人被缩减为生产机制的零件。

最后,强调劳动解放的“制度性”背景和前提,探

究人工智能之于劳动解放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我们应从更为深入的结构层面去理解异化。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本以异化的形式被历史地建构为社会一般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只不过是看上去可以为生产者所用,以满足他们的自身利益,事实上却恰恰相反。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在结构上重构了价值的规定,因此这种生产力有助于加强了对生产者所施加的抽象压迫。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作为劳动的抽象维度的属性而发挥作用,并且成为统治生产者的手段。生产力每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都会被重新规定为抽象时间参照系的基准水平,并成为社会普遍的强迫性规范。作为一种生产活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在结构上成为整体性的一种属性,对立并统治着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劳动的具体维度为其抽象维度所占有^{[5]403-405},“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0]。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机器章”中,马克思指出:机器本身缩短了劳动时间,但是当它被资本雇佣,它又使得劳动时间延长;机器本身减轻了劳动强度,但是当它被资本雇佣,它又增强了劳动的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但是在资本的掌控中,它使人成为那些自然力的奴隶;机器本身增加了生产者的财富,但是在资本的掌控中,它又使生产者沦为穷人^{[2]203}。换言之,资本作为由劳动所中介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异化结构,在推动社会一般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将一般生产力纳为自身的一种属性,使其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发展,对立并个体。因此,马克思并不将科技的发展当作单纯的技术发展,或是当作一种独立于乃至对立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根据他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一般知识和能力,作为资本的属性,已被纳入生产过程之中,并不断强化着抽象时间的统治。

综上所述,劳动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

个经典命题,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免受剥削和支配,使劳动过程具有更多的自主性;二是免受抽象时间的统治,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赢得更多自由时间和空间;三是扬弃劳动中的异化感受,获得更加丰富的自我经验和全面自由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劳动解放提供了广阔前景,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运用,却产生了劳动吸纳与劳动排斥、自由时间的享有与抽象时间的统治、感性体验的丰富与“无关系的关系”的异化等悖论性意涵。分析人工智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解放的悖论性意涵,无疑有助于廓清“劳动解放”这一经典命题在当代的表现形态和实现路径。

参考文献:

- [1]尼克·迪尔-维斯福特.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M].燕连福,赵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HASSAN R. *The Condition of Digitality: A Post-modern Marxism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Life*[M].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20.
-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5]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 [6]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7]JAEGER R. *Aliena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18.
- [9]FUCHS C. *Karl Marx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M]// CHANLER D, FUCHS C.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55.
-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